

內飽受卑視與揶揄，更有在報章專欄撰寫「中醫投降」，偏陋寡識以蠱惑吾民，也有謂我進榮總、馬偕花我數萬都未能治我病，汝三、五塊錢樹皮草根也夢想醫我疾。嗚呼！良藥苦口、苦口婆心。豈金錢萬能乎！真坎蛙不足於言海，夏虫不足以言冰。炎黃子孫驚鈍如我者，猶感悲嘆！連言其他博才遠矚，有志之士之喟泣矣！現代醫學偏向於所謂內臟外科，內科之學荒殆也已久，咸以一割而萬病除，殊不知手術雖成功，病雖除而病人也已完矣！醫學是治病人豈是治病爾。醫學本不應有中、西之分，凡能救人使病人恢復健康，登祇幸福之域者皆我所需要者，兩者皆有其利，也有其弊。如何包容中西，擷取其長，摒棄其短，斯為正途。但偏有人障眼說話，謂其不科學、古老，樹皮草根何以治病。殊不知，天生衆民，自然物我。今雖合成藥品日有發明，但僅限於龜壳上的變化，可以說已達到極限，而有不得不反求諸於天然生藥者。相思子、喜樹、龍吐珠等不但被廣泛研究，而且在抗癌的戰爭中已露出了勝利的曙光。中國醫學不科學嗎？未科學也非不科學也。金針的奧妙，經絡的探尋，雖以今天的科學仍無法闡明，但其臨床上的實用價值，不但我們重視，且受世界先進國家們的普遍重視，早在1945年已有世界性的「針灸協會」產生；天然藥物的配伍，君臣佐使的靈活應用，寓理神機，妙趣無窮。如白虎加人參湯的治療糖尿病，單就知母和人參單獨應用，雖均能降低血糖，但二味相加却有相反的抵消作用，但再加上石膏糯米，却反而又有協和加強作用。而我們的老祖宗又為何知道如此配合應用呢？此何奇也？不科學乎！今天的藥理解釋，在中國一千七百年前，却早已用之如夷。諸如此例，俯拾即是，仍有待於我們今日的生藥學和藥理學專家們，努力繼續研究，我們是醫學院的學生，尤其在中國醫藥學院，不但有最佳的環境，也肩負著最大的任務，我們應當發揮我們學院的特色，發揚我們漢方醫學的長處。一個國家應有其獨立的精神，民族亦應有他自尊的品格。這種精神和品格表現在醫藥教育上，就是一面要吸收新知，融合固有醫藥，形成一個嶄新的、現代的能夠代表其民族，發揮濟世救民的最大功效的民族醫藥的新醫藥。今天我們要富強，要恢復民族自尊心，不是一味盲從全盤西化的莊敬他強而是兼容並包獨立創造的莊敬自強。

本文係愚初習論述之作，淺陋稚言之處尚祈師長，不吝指正教導。本文蒙家父殷殷指導，銘感五內，特此致謝。

#### 十一、參考書籍：

- 1 傷寒論，金匱要略（漢、張仲景）
- 2 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清、陳修園）
- 3 醫宗金鑑（清、吳謙等）
- 4 皇漢醫學（日、湯本求真，周子敏譯）
- 5 漢方診療醫典（日、大塚敬節等，何志鋒譯）
- 6 漢方治療之實際（日、大塚敬節）
- 7 漢方大醫典（日、大塚敬節）
- 8 傷寒論解說（日、大塚敬節）
- 9 漢方處方解說（日、矢數道明，吳家鏡譯）
- 10 醫方集解（清、汪昂著）
- 11 常用中藥之藥理（顏焜熒）
- 12 中藥成分最新研究（許鴻源）
- 13 中國醫藥雜誌（中國醫藥研究所）
- 14 健康藝術（張駿主編）

# 劉銘傳與台灣的近代化

林震旦

## 一、前言

認識台灣，必須認識台灣的近代化，認識台灣的近代化，必須認識劉銘傳。因為他是近代中國的一位傑出人物，更是台灣史上應該特筆大書的人物，他的豐功偉業不在鄭成功之下，鄭成功光復台灣，劉銘傳則保全之外，復予以建設，近代台灣的政治國防，經濟交通，文化教育，均在他的手中樹立下規模，奠定了基礎。百年以來，中國的朝野上下的有心人莫不以近代化——自強相尚，劉銘傳固然只是其中之一，而瞭解最深，持之最堅，赴之最力，成績最著的，很少人可與他相比。但他的具體表現，是在台灣，這是不可否認的史實。

## 二、雄才大略的劉銘傳

劉銘傳，字省三，諡壯肅，清安徽合肥人，生於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卒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享年五十有九。他是咸同年間洪楊革命，所造成的風雲人物之一。故鄉是戰亂的中心，地方團練紛起，築堡自衛，十八歲的劉銘傳亦乘時而起，懾悍威稜特著。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他參加了李鴻章的淮軍，所部五百，編為銘字營。淮軍所奉的第一個使命為東援上海，保住這個清軍餉源攸關的通商口岸，而它之能夠自安慶通過太平軍所控制的燕湖南京江面，則得力於英國輪船。林則徐、曾國藩等最初所注意的西洋文明為輪船（尚有大炮），李鴻章、劉銘傳首先所接觸的西洋文明亦是輪船。置身於國際化的上海之後，更使他們獲得進一步的認識。英法軍與洋將所訓練的洋槍隊即「常勝軍」，給他們以深刻印象。李鴻章目睹其兵器精巧，隊伍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囑咐他的部將虛心學習，而部將中最能接受新知識者則為青年將領劉銘傳。中國軍隊首先練洋操，用洋槍者為淮軍，而淮軍中以銘軍的成績為最佳，因為銘軍的長官有進步的頭腦，開濶的胸襟。銘軍中的著名的洋教習有法人畢乃爾（Penell），呂加（Rhod）。畢乃爾與銘傳關係尤密，為管洋砲營，官至總兵。有人謂：「西人槍砲隊法，惟淮軍獨精，公（銘傳）軍尤為獨擅，至為通國導師」，實非過譽。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一八七一年一月六日）詔謂：劉銘



傳軍營均練習洋槍隊砲隊，步伐整齊，號令嚴肅，命「各省咨取其教演章程照辦，實事求是，變疲弱為精強」，銘軍成了各部隊的模範，劉銘傳成了無形的訓練司令。凡是遇到對外事機緊急，必召他赴難，如同治八年（一八七〇）的天津教案，光緒六年（一八八〇）的伊犁爭議，光緒十年（一八八四）的中法戰爭。

劉銘傳的知名，由於平吳（打太平軍）、平捻，他之官拜直隸提督晉封男爵，亦是此兩役的酬報。但是他卻自鄙這些戰功為不足道，將當時文牘，一以火之。因為這是消極的，破壞的內戰，不值得留念，今後的工作應是積極的，建設的，對外的。何況「削平髮（太平軍）、捻、全恃勝山砲制勝疆場」。他歸之於科學武器而不自居其功。他有時代認識，進步思想。他與清季的開明人士李鴻章、丁日昌、馮桂芬、郭嵩燾、薛福成、嚴復均瞭解近代中國是一個大世變，及必須致力的途徑。他曾說：「中國自與外洋通商以來，門戶洞開，藩籬盡撤，自古敵國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強也」（奏議卷二）又云：「泰西製造之精，日新月異，中國踵而行之，已居人後，若再因循坐誤，一旦變生倉卒，和戰兩窮，將何以自立」。又謂：「自歐美興與，利砲堅船，橫橫海表，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勢，廓馬盡變。臣嘗發憤太息，謬思得雄才大略，總括海疆，內勤耕商，外興製造，船台電砲，戰守相資，循此十年，且將縱橫美國」（奏議卷一）。他將事情看得雖不免簡單，而其看法與抱負確不平凡。而他的「變西法，罷科舉，火六部例案，開西校，證西書，拔真才」的議論，尤為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他大聲疾呼，謂如不此之務；不出十年，事且不可為，中國將不可問。此後數十年的維新改革，均不出乎他所說的範圍，可惜不曾徹底的，有效的作到。

他在應變、應行的「西法」中，認為鐵路更是自強的機括。中國最早的一條鐵路為上海吳淞鐵路，但是此路既非中國自造，而且路線過短，最後又終於拆毀。第一位建議在台灣興辦鐵路的固為丁日昌，而第一位建議在中國大陸大舉興辦鐵路的則為劉銘傳。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以伊犁問題嚴重，劉銘傳奉召入京，及俄事將定，十一月初二日（十二月三日）為亡羊補牢，正式疏陳其鐵路政策。首

論中國處境之危，各國環視，欺陵挾制，「俄地橫亘東西北，與我接壤交錯，拊背扼吭，尤為心腹之患」。而日本亦藐視中國，遇事與我為難。「每私憂切歎，以為失今不圖自強，後雖欲圖，恐無及矣。」次論「自強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括則在於急造鐵路。鐵路之利於漕務、服務、商務、礦務以及行旅釐捐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為急不可緩之圖（奏議卷二）他主張舉借洋債，乘時力辦，以北京為中心，南路二條，一經山東達清江，一經河南達漢口；北路二條，一東通盛京，一西通甘肅，目前可先修北京至清江一線。真是偉大的計劃。他更謂：「若一旦下造鐵路之詔，顯露自強之機，則聲勢立振，他人窺伺之心，從此潛消。然時人多不能了解，有的說開造鐵路有三大弊，未可輕議施行，有的說中西情形不同，無利有害，有的說有妨民間生計，及稅釐收入。李鴻章雖主依其議，惟不以借洋債為然。結果政府決定予以擱置。直至八年之後，始又回到這個路上，而付諸實施。亦證明劉銘傳的真知灼見，非常人之所能及。

### 三、台灣建省與添改郡縣方案

國際關係轉變了近代中國，也轉變了近代台灣；外患震動了近代中國，也震動了近代台灣。中國再不能抱殘守缺，閉目酣眠；台灣亦開始警覺奮進。大家均感到情勢不同，必須拿出新的作風，應付新的環境，急起直追趕上時代。以往三十年英、美的寇擾窺伺，各國的開港通商，當局者尚不會真正認識台灣危機的嚴重，直至日本與師動衆，佔地焚營，殺人焚村，大家才切實的覺得事態的可怕。再經中法之戰，大家又開始感到台灣的危險，認識台灣的重要。所以，向被忽視的台灣地位，卻為之一變，這不能不感謝西鄉從道。最後促成台灣的建省，則又不能不感謝法國的孤拔。而第一位正式提出台灣建省問題的人，是袁保恒；奠定台灣建省基礎的人，是沈葆楨；完成台灣建省大業的人，是劉銘傳；承啓沈、劉之間，關係最大的，是丁日昌；從旁協助，而最為關注的人，仍為李鴻章。經他們努力之下，終於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一八八六年一月十六日），台灣成了中國的第二十個行省，第二個新建省，較之第一個新建省新疆年青不到一歲，較之東北三省尚年長一十有七。劉銘傳成了台

灣省的首任長官。

自同治六年（一八六八）至光緒十年（一八八四）的十餘年間，劉銘傳的出處總是難進易退，看來近乎消極，而其實他最有理想，血性與事業慾，在環境不許他積極的有一番作為展布之時，祇好毅然潔身而去。如果給他一個可以有為的機會，定必全力以赴。他鑒於時代變化之劇，國家處境之危，久有志於海疆，特別是台灣。現在機會到了。他深知台灣與整個國家關係的重大，與台灣情勢的險惡，「恨不能倍日經營，保固海疆門戶，前車不遠，後患方長，不敢視為緩圖，致資強敵。」進而他更「舉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範，」「以一島基國之富強。」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模範省，奠定中國近代化的基礎，是他最後的願望。他的新政措施，處處本著這個原則。安定秩序、整理財政、充實國防，是他的三大政策，亦為最有成就的工作，其中最後一項尤有意義。他曾說：「辦防以禦外侮，撫番以清內患，清賦以裕餉需，此三事均為急不可緩」（奏議卷五），這是他在光緒十二年二月（一八八六年三月）所提出的目標。

台灣建省之前，劉銘傳於光緒十一年六月（一八八五年七月）條陳善後事宜之時，即已列舉設籌防務，講求軍政，清理賦稅，招撫生番四端，提出三大政策的輪廓。決定建省之後，經兩度與閩浙總督楊昌濬面商（昌濬對台灣建省亦係十分關心的人）；光緒十二年六月（一八八六年七月），他奏上建省事宜一十六款，為便於施政，增高效率，其中一項即為調整行政區域，添官分治，確定省會。及光緒十三年八月（一八八七年十月）撫番擴疆工作大致辦有頭緒，復會同楊昌濬奏上添改郡縣方案。以山前論，彰化、嘉義、鳳山、新竹、淡水等縣，縱橫至二三百里，耳目難周，聲氣多阻，山後中北兩路，延袤三四百里，並無專駐治理之員，不易遙制。他們主張第一照岑毓英原議（毓英任閩撫時，曾於光緒七年八月來台勘閱，認為籌辦台防，必須使南北聲氣相通，台灣府城偏於一隅，不易顧及北路，主將府道移設彰化），於彰化橋考疆地方建立省城，分彰化東北境設首府曰台灣府，附郭首縣曰台灣縣，將原有之台灣府縣分別改為台南府安平縣。分嘉義東境，彰化南境，添設雲林縣，分新竹西

南之地，添設苗栗縣，合原有之彰化及埔裡社通判四縣一廳，均隸台灣府。分淡水東北之地，歸基隆廳，改通判為同知，與淡水、新竹、宜蘭三縣同屬台北府。（光緒二十年，即一八九四年，續改大科崁為南雅廳，亦歸台北府）。台南府則轄治安平、嘉義、鳳山、恒春四縣及澎湖一廳。後山添設台東直隸州，治水尾，另於坤南廳改設直隸州同知（按台東直隸州治後定於埤南），花蓮港添置直隸州判。統計全省三府，一州，三廳，十一縣，與現行的行政區域，相差無幾。

### 四、劉銘傳經營台灣的三大政策

劉銘傳是一位有頭腦，有抱負，關心大局的人物。自奉命至台之後，即審度時勢，辭去福建巡撫，「竭全力以謀台，以免顧此失彼」。誠如「劉壯肅公奏議」的編者陳澹然所論：閩撫安，台防危，閩撫逸，台防勞，閩撫地大而權尊，台防不過一虛名欽使，平時設防兵餉，仰人鼻息，一有外患，輒當其危，「公奈何獨辭閩而就台？蓋公一生血性，既已身當台難，必思安治台地，然後可保七省門戶，以快其心。英雄舉動，每思獨闢規模，實非尋常所能窺測」。因為他認識台灣，重視台灣。所以積極經營台灣，期「使台地之財，足供台地之用」，達到可以「處常」，復可以「處變」的理想。他所施行的安定秩序，整理財政，充實國防的三大政策，即奠定了台灣近代化的基礎。

#### （一）安定秩序

安定秩序，乃為政的先決條件，撫番則為其第一要務。沈葆楨倡之於前，吳贊誠、丁日昌，岑毓英繼之於後，然均弗克久於其事，成效不著。因為這種艱巨工作，需要相當的時間，計劃須周詳適宜，執行須徹底認真。台灣番社約八百有餘，人數約二十萬，由於生活習慣，性情兇暴，獵人如獸，每年戕害民命不下千餘。而不法之徒，及土匪盜賊，出沒番地，聚集番界，侵佔番族田廬，誣騙番民財貨，「奸民被殺，則訴冤於官，官輒與師剿辦，番族被冤，則無官可訴，類多集衆復仇。」殺掠多係良民。所以番禍並不能專責番人，政治的不平亦為主因。就對內言，「終至民番俱斃」，就對外言，



「防海又須防番。」萬一外寇猝臨，陰結番民（同治十三年，即一八七四年，日本人曾作過這種工作），真心腹之患。「誠令全番歸化，內亂無虞，外患難來，尚可驅之禦侮，既可減防節餉，又可伐內山之木，以裕餉源」（奏議卷二）。進而闢地廣墾，增加生產，使財有所出，漢番生活亦隨之改善。所以劉銘傳的撫番是漢番利益兼顧，安定秩序與充裕財源並重，對內亦是對外，積極的意義尤大於消極的作用。至於他的撫番策略，則以恩威並用，剿撫兼施。恩撫不從，方行威剿，威剿之後，仍歸恩撫。官吏凌虐番民，漢人奪佔番地，均予懲處禁止，絕不偏袒。番人之劫殺居民，不聽曉諭，則威之以兵。一般官紳均謂番性反覆，山險難通，他力排衆議，一意經營。光緒十一年十月（一八八五年十一月），首撫北路淡水（今台北縣）東南馬來番，為定規約，命遣子弟至城讀書，雜髮歸化，生番地界，各歸各業，不許軍民侵佔。並開馬來至宜蘭道路百餘里。此為提督劉朝祐的成績。明年二月（一八八六年三月），銘傳親至大科崁撫定該處及新竹菜寮一帶番社（以上北路）。道員林朝棟駐兵新竹、彰化間的罩蘭，與總兵柳泰和（湘軍）辦理中路，提督章高元招撫埔裡及花蓮港地區，副將張兆連招撫後山，總計光緒十一年冬至十二年夏，半歲之間，招撫四百餘社，歸化七萬餘人。光緒十二年七月（一八八六年八月），中路兼魯番叛，銘傳自來罩蘭督師，增調提督英宏洛等會剿，歷時二月始定。叛亂原因由於居民欺虐，官抑不伸，銘傳當將罩蘭撫墾委員撤換，清結民番積欠，劃明地界。尋又返回大科崁；再定北路日阿歪等社。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春夏之間，後山張兆連等續撫二百一十八社，番丁五萬餘人，前山章高元等續撫二百六十餘社，番丁三萬八千餘人，田園數十萬畝。

劉銘傳深知開通道路是撫番的首要工作，所以除劉朝祐所闢自馬來通宜蘭一道外，張兆連請開嘉義直達埔南，林朝棟及撫墾辦大臣林維源等之開中路、北路，均各有所成。而橫貫前後山之打通，關係尤鉅。這是張兆連與台灣道陳鳴志的主張，此路一成，則東西聲氣聯絡，番人當聞風向化，否則招撫雖多，馴服仍艱。劉銘傳深聽其議，因命章高元自彰化集集街鑿山而東，張兆連自水尾鑿山而西

，會於丹社嶺。峭壁深谿，鑿崖伐木，於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春間，一百八十餘里的山路竣工，「軍聲轟震岩谷，威德遠播遐荒，使深山幽谷，穴居野處之倫，嚮化歸仁，化獠而登衽席。」（奏議卷四）。「遂頒憲書，奉正朔，設教條，雜髮，立社長束之。」（奏議卷首敘四）。但是問題並不如如此簡單，番族千百年的習性，亦非一朝一夕所能全部化移，騷動變亂自仍不免，甚至引起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年秋北路及中路之亂，分別為林維源、林朝棟所定，而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後山北路埔南呂家望社之變尤為嚴重，匪首劉添旺從中煽動，廳治被圍，蔓及花蓮，除由本省部隊增援外，且調北洋水師總兵丁汝昌以軍艦助戰，兩月之後，始行肅清。明年（一八八九年）又有後山北路之變，副將劉朝帶在蘇澳附近開路，與所部二百餘人中伏戰歿，銘傳改派澎湖總兵吳宏洛進剿，光緒十六年正月（一八九〇年二月）復親往督師，絕其糧道，兇番終於乞降。全台大定。於是廣招福建貧民墾墾，使番衆與內地人共處雜居，逐漸轉移他們的習俗，化之於無形，同時改進他們的經濟情況，使「耕織自精，財貨自殖。」各重要番區如大科崁、東勢角、埔里社、蘇澳、花蓮等處，各立撫墾局或分局，設置番社，振興茶葉、樟腦。局中有醫生、教耕、教讀等人員，開義塾，番童子弟來讀者千數百人。另於台北特設番學堂，與之衣食，課以漢文、算術、官話、台語，起居禮儀，常令與漢人晉接，潛移其氣質，消除疑忌，使不以異類自居。為了撫番，劉銘傳曾「三親絕域，蒙瘴涉險，不驕而徒。彼豈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遠也。」（奏議卷首敘四）。

## （二）整理財政

建設工作，需靠財政的支持，丁日昌之所以不能暢行其志，即因困於財政（日昌曾任閩撫，對台灣建設，備極熱心）。劉銘傳深悉其癥結之所在，決心切實清釐台灣的收入，作到自力更生。以往福建每年濟台八十萬兩，但並不能按期如數解到。他與楊昌濬商減為四十四萬兩，以五年為限，開山撫番，建造城衙，及一切交通軍事建設，百廢待舉，事繁費巨，不得不就地籌畫，「期三五年後，以台

地自有之財，供台地經常之用。」台灣為富庶之區，如將錢糧稅收一律清查，不惟能自給自足，且可有盈無絀。

田賦為主要財源，清賦為理財的首要工作。台灣係新開之地，田產甲於東南，康熙以來，田園從未清丈，雍正、乾隆之世，且屢有台賦不准議加之詔，田畝日闢，而賦不增。但民間的負擔並未減輕，墾戶之租亦重。原因是紳民將土地霸攬，祇須向官府遞稟承包，即可募佃墾荒，不費一錢。成熟之後，每年抽收「大租」、「屯租」、「番租」、「隘租」等項，均為土豪私納之名，於公家無與。正供糧課，毫無續報升科，一任隱欺吞匿，光緒十一年六月（一八八五年七月），劉銘傳即認為全台賦稅清理為急宜舉辦之事。明年四月（一八八六年五月）正式開始，於南北兩府各設清賦總局，選派三十餘人，分赴各縣，會同地方士紳，先查保甲，就戶問糧。戶畝查明，再行逐田清丈，就田問賦。丈竣之後，一律由藩司給單，私租悉行入公。內地歷辦清丈，雖一州一縣，往往數年尚未告成，而台灣於光緒十三年九月（一八八七年十月），淡水、台灣、嘉義、彰化等縣辦理完畢，明年六月（一八八八年七月），大致就緒，為時不過二年，「隱匿者揭報，開墾者升科，盈溢田糧，計逾舊額不下四十萬兩，民間供賦，反比從前減輕」（奏議卷七）。中間因嘉義、鳳山延誤，彰化攪阻，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始全部清丈給單，溢出原額田數倍，約四百萬畝。

台灣供賦輕重，南北懸殊，嘉義、台灣、鳳山、約沿鄭氏舊制，失之過重；彰化，淡水則照同安下沙則折征供粟，賦額較輕。今則將現丈田園，悉照同安下沙成例，分則配征，清釐劃一，化甲為畝，仿一條鞭辦法，刪繁就簡，以便鄉愚易知易從，胥吏無所賂削，較各縣最輕之賦，有減無增，「定則雖輕，徵數較鉅，民生國計，裨益實多。」豪紳地主不能再事隱匿，人民的負擔歸於均，蒙受實惠。正供之外，所謂「補水」、「平餘」，亦予明定章程，不得任意加派。他自謂「寧為怨府，不累小民」，這才真是為政之道與任公職者應有的精神。台灣原額賦銀十八萬兩，現在則達到六十七萬餘兩。不過清賦工作，極為瑣屑繁重，亦易於滋弊擾民。

開辦之初，官紳半數以為不可，土豪尤感於已不利，多方阻撓，加之部份不肖官吏粗率貪狠，乘機勒索，因而激成民變。光緒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一八八八年十月四日），彰化施九緞等之亂即係著例。聚衆數千，圍困縣城，毀斷電線，要求收燬丈單。提督朱煥明戰歿，旬日後道員林朝棟至，城圍方解，又旬日亂平。直接負責的彰化知縣亦予撤革，宣布脅從罔治，仍以地方士紳任善後，足見銘傳磊落無私的精神。

除清賦之外，則為稅收。台灣洋藥（鴉片）、煤斤、茶葉、樟腦、船貨釐金、向多吞匿侵蝕，合塩課關稅，總計不過九十萬兩。經銘傳整頓，樟腦、硫磺由官收買出賣，餘利四萬餘兩，百貨釐金增至七萬餘兩，茶葉十三萬兩，塩課十二萬兩，洋藥四十餘萬兩，關稅一百餘萬兩，與田賦等合計約三百萬兩，最後增至四十餘萬兩。另設官銀局，購辦機器，鑄造銀幣，每年數十萬枚——這是中國自造銀元的開始。有了這筆財力，不惟不再恃福建的協餉，而一切建設新政，亦就一一見諸實現。

## （三）充實國防

在台灣建省前二十五年，我國已推行自強運動，但其成效迄無足觀。而台灣在短期間則頗有所成。沈葆楨、丁日昌發其端，劉銘傳奠其基，交通、工礦、農商、教育他均有一番經營，不惟粗具規模，而且大開風氣。

（甲）從軍事看 劉銘傳鑒於中法戰役的教訓，他首先著手軍事建設，特別注意聯繫台灣與大陸的澎湖。此島「非獨全台門戶，實亦南北洋關鍵要區。守台必先守澎，保南北洋亦須以澎，廈為管鑰」（奏議卷二）澎湖關係台灣，台灣關係中國，所以「台澎之防，豈特台澎，所以固吾圍也。」以台澎的地位論，當然需要一枝強大的新式艦隊。光緒十一年六月（一八八五年七月）他曾與楊昌濬奏請劃海軍為三路，津沽為北洋，吳淞為中洋，台澎為南洋，政府亦承認有此必要。但是建立海軍不是一件易事，中國無同時編練三枝艦隊的力量，祇得先以全力去辦北洋。原定為台澎購置的四艘鐵甲快船亦編入了北洋艦隊。劉銘傳請撥次等稍快兵船二艘，再購大小魚雷數艘，以作防患巡海之用，亦不曾辦到。



劉銘傳以兵船既一時難集，砲台必須製辦。澎湖、基隆、滬尾、安平、旗後五處趕製砲台，添購新砲，計需款八十萬兩，向中央請撥，戶部要他量入為出，逐年撙節，另款存儲，俟集有成數，再將各砲台次第興建。然而治防是何等緊急之事，撙節存儲，待至何年？如不及時趕辦，一有兵事，倉皇束手，海疆難安。何況砲已訂購，到期洋人催索，亦無以應。於無可如何之中，由閩台各借四十萬，自行籌還，方將十座洋灰鐵筋砲台完成，三十一尊阿媽士頓（Arm Strongs）大砲辦齊，另配水雷八十具。（光緒十四年基隆砲台，又由德人龐斯（Baons）督工重修）。澎湖副將改為總兵，以曾守吳淞砲台，歷辦廣東海防，深悉外洋火器精微之吳宏洛任之。至於駐防台省的三十營防軍，均用洋槍，聘外國教習教練（劉來博即其一），必須自製彈藥，以免一旦海運不通，接濟斷絕。因於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在台北開設機器局，小機器廠製槍彈，大機器廠造砲彈，工程師為德人彼得蘭（Bitgran）。為存儲之需要，並設軍械所。

乙從交通看 交通建設是劉銘傳最有意義的工作。他係倡議興辦鐵路最力的人，謂：「鐵路為國家血脈，富強至計。」以往以格於事勢而未獲見諸實行，現在可以實現他的理想了。何況丁日昌既有修造台省南北鐵路之議，內地的開平鐵路已有成效。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日（一八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他奉請借商款開辦，既可繁興商務，便利驛遞，且有裨於海防及建省、興橋工。路線起自基隆，以達台南，路軌火車向英國訂購。枕木則就地取材，特設伐木局。先修台北至基隆段，自台北北門外大稻埕開始，以兵代工。督辦為內閣學士林維源，工程師有德人碧加（Becker），英人瓦特遜（W. Watson），密徹爾（M. Mitchell），瑪體孫（H.C. Matheson）。明年（一八八八）台北、新竹段亦開之。以商股觀望不前，經辦人李彤恩、楊宗瀚一死一病，收歸官辦，挪用原擬備作建造省城經費。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基隆、台北段通車，台北、新竹段於二年後完成。這是台灣縱貫鐵路的始基，其功甚偉。

至於對外的海上交通，開港通商之後，往來於台灣的祇是外國輪船。沈葆楨渡台，閩廠所製兩輪

，始不時航行於閩台之間。岑毓英時代，又置辦兩艘。中法戰爭期中，運兵運餉，均為雇用英德之船。戰後閩廠萬年青與伏波兩船，已不堪使用。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先後添購德輪二艘，另在香港訂造四艘，並由南洋僑商集資續置二艘，除航行上海、香港外，並遠至呂宋、西貢、新嘉坡。基隆港口已開始建築，旗後、安平亦在計劃之中，且製挖泥器船，作為疏濬之用。

台灣在沈、丁時代，南部電線雖經開辦，但是祇限於府城至旗後、安平，不足百里。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劉銘傳決定先架台北至基隆、滬尾及台南的陸線，共八百里，以聯通全島，復敷設安平至澎湖、滬尾至福州的水線，以接大陸。以上工程，均於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完成。並設有電報學堂。他尚計劃辦電話，可惜未成。同年郵政局成立於台北，且備有郵船二艘，往來於本省各港及福州、上海，較中國正式開辦郵政尚早九年之久。

丙從工礦看 基隆煤礦開辦以來，頗有流弊，漸成漏卮。中法之役，復經毀壞。戰後初由商人承辦，虧折不支。劉銘傳以煤炭為船廠、兵輪、鐵路、機器局所必需，乃商同西江總督，船政大臣合資經營，官商各半，添置機器，聘用西人，並自礦廠修築鐵路至基隆碼頭。光緒十三年一月（一八八七年二月）開辦，一年後商股因無利退出，收為官辦，派英人瑪體孫監督工程。以舊有礦井煤質已完，頗有虧折。適英商願集資承辦，另闢新窩，合同業已擬訂，而政府不准，詔旨申斥，仍令自辦。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再改官商會辦，戶部總署復行指駁，嚴詔責其膠執已見，率意徑行，意予以革職留任的處分。結果仍暫由官辦，新窩無力另開。劉銘傳的堅決請去，此亦一主因。可見當時辦事的困難。

煤礦之外，油礦亦曾於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勘探，不久停頓。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銘傳設煤油局，派林朝棟主持，產量不大。兩年後曾與承辦煤礦的英商議一承辦油礦合同，中央亦不准行。銘傳離台，煤油局遂裁撤，殊堪惋惜！

丁從農商看 農業方面，劉銘傳力事提倡種茶、植棉、栽桑、養蠶等等。水利灌溉，亦所留意，曾派德國工程師墨爾溪設計大科坎水源，準備開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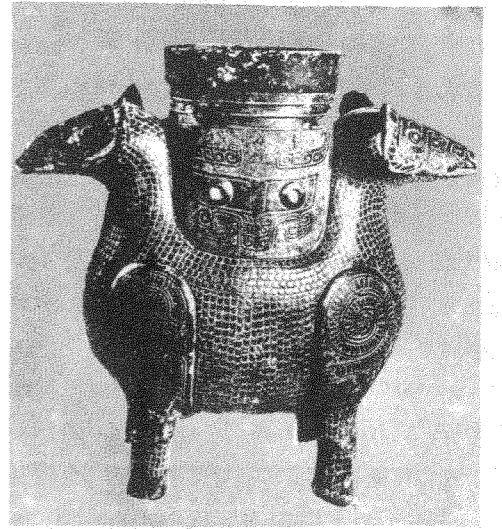
巨圳，可惜未及實行。至於商務方面，他立有通商總局，鼓勵對外貿易，糖、茶、樟腦為出口大宗。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設招商局於新嘉坡，派員招致南洋閩僑來台合辦商務。劃台北大稻埕為商埠，由富紳修建街市，江浙商人開設興市公司、馬路、電燈（光緒十四年）、自來水、醫院一應齊全，台北儼然成爲一個近代都市了。

戊從教育看 劉銘傳認為推行新政，必須新的人才，而培養新的人才，則必須新的教育。台灣的一切軍事，交通、工廠建設，均不能不借用西人，此乃不得已的辦法。所以他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首設電報學堂，第二年春天開辦中西學堂。這是台灣第一個新式學堂，性質近乎工業學校。早晚的功課為中國經史文字，上下午專習西學，英人布茂林是主要教習。先之以英、法語文、史地、算術、物理、化學等基本科目，「漸進以圖算、測量、製造之勞，冀各學生砥礪研磨，日臻有用，而台北現辦機器製造，煤礦、鐵路，將來亦不患任使無才。」（奏議卷六）。這是他的最後希望。他並且不時親蒞學堂觀察，獎勵，達到他的願望。

## 五、結論

台灣在劉銘傳六年的經營，面目一新，向富庶之道上邁進。有人說他：「倡淮旅、練洋操，議鐵道，建台省實創中國未有之奇」，而其最偉大的成就，最值得景仰的事功，則為「建台省」——建設一個近代化的台灣。但他在台六年（光緒十一年至十七年，即一八八五至一八九一年），由於軍政愛勞，屢入山地，感受瘴濕，手足麻木，耳閉目障，視聽俱茫，曾請假一月。假滿之後，舊疾未愈，又增咯血氣喘，舉步艱難。光緒十六年六月（一八九〇年七月），一度請辭，以便就醫。九月（十月）復以煤礦章程問題，受到無理的處分。他是一位志性亢爽，恢廓雄偉而不肯阿諛朝貴的人，主持台政之時，曾謂台省革創，不能拘泥部章定例，已使文墨之吏不快。戶部尚書翁同龢是中央的紅人，素與李鴻章政見不合，劉為李的舊部（實際李劉之間亦有意見），因而每被牽入，所謂常遭阻撓，礦業亦其一例。過去幾年醇親王當政，他在親貴中比較開明正派，對於劉銘傳的事業頗為賞識，尚能給以便

利。十二月（一八九一年一月）醇親王去世，益使他感到無法再安於位。遂於光緒十七年三月初四日（一八九一年四月十二日）第四次請求開缺（第二次在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是爲了礦務章程，第三次在一八九一年一月七日，即醇親王卒後的第七日）。三月二十七日（五月五日）正式獲准，四月二十八日（六月四日）實行交卸。此洵爲台灣的不幸，國家的不幸！



高級學文  
紙書生用  
張雜誌具  
總誌用品  
沖洗相片

## 福興文具店

應新  
有式  
盡卡  
有片

敬價  
請錢  
比公  
較道

號二十五路平太市中台